

##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编者按：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需要看到的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在带来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引起了新的问题、新的争议。技术与文化深度融合，人类的主体性是否动摇？虚实的边界日渐模糊，法律的规范如何同步？大众日报理论周刊本期推出专题，探讨人工智能善治之方。

# 人工智能将把人类文化引向何方

□ 解学芳

■在人机协同塑造文化新范式过程中，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创意、情感与价值判断如何和人工智能完美结合，确保具有情感和审美力的“人”作为主体，实现人机“共同进化”，这是智能时代文化创新的内核与关键所在

虑和威胁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远忧——对于从事精神文化生产的创意阶层而言，其作为“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受到巨大的挑战。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是部分介入文化生产领域成为人类的辅助工具，还是全方位进入文化创意领域进而替代人类？这逐渐成为热议的现实命题。

### 文化新图景与文化隐忧并存

人类文化变迁史实质是技术创新史。人工智能技术爆炸性演进，使其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的支配性技术，即形成了一个由大数据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高新技术群的集聚，变革着文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文化内容的创制和传播，形成了人工智能技术文化与文化生产之间自生、共生、再生的关系。特别是2023年以来，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深度介入人类文化生产，从“人-人”关系走向“人-机”协同关系，造就了全新的AIGC模式。所谓AIGC模式，是指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实现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内容场景的自动化智能化生产。

AIGC作为文化新生产力，依托内容自动化生成的训练数据、芯片算力、深度学习算法、场景决策模型、多模态技术等人工智能技术集合，打造了一个“文化内容更加丰富，文化产品更加富足，文化生活更加多彩”的新文化图景，也带来了数智文化的崛起和传统文化业态的衰退。从AIGC世界的技术本质来说，人工智能理解真实世界的能力进一步跃迁，以“全知全能”的角色介入文化应用多元场景——包括文学作品、绘画、短视频、游戏乃至长视频、影视制作等文创内容的生成，也包括文化内容智能运营和智能传播领域的音视频智能营销，以及虚拟偶像、虚拟演员、虚拟导游、智能剪辑、AI审核与评级等服务。从AIGC模式赋能的文化体验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在交互中赋予受众感官体验与审美能动性——在跨智能感知与虚拟现实技术的支撑下，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电视通过语音交互、面部表情、脑电波数据捕捉打造受众全感官的体验，并通过受众心理与文化偏好的智能反馈机制，带来文化体验感的延伸与升级。

虽然 AIGC 作为新质生产力和内容生产模式会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持续创新，但在技术属性上，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未来

的突破性发展仍然会受到算力、算法、伦理法规的制约，对其保持积极且审慎的态度至关重要。特别是 AIGC 模式在带来文化生产周期短期化与人类文化生产能力跃升的同时，也带来全新的文化隐忧。

一是 AIGC 模式下文化生产隐含着**意识形态风险**。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AIGC 大数据语料的语种选择也会对生成的文化产品价值倾向产生影响。以 ChatGPT 为例，OpenAI 公布的资料显示训练 ChatGPT 的数据资料大多来源于英语国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机构、团体和社交平台，将不可避免地隐含着西方价值观念。

二是深度合成乃至深度伪造带来的**侵权风险增生等新型安全危机**。AIGC 可能会偏离客观中立的初衷，生产出继承并强化训练作品中国有的种族主义、性别偏见、暴力、色情等负面因素的虚假报道、不良文学作品、恶意见视频等内容。如 OpenAI 的图像生成模型 DALL-E、谷歌的 Imagen 模型均曾被指存在性别歧视问题；而 Stability AI 曾被指控为“复杂的拼贴工具”，侵犯了无数受版权保护的图像。

四是在 AIGC 模式下创意主体“灵韵”的消失。弗洛姆曾说，“在过去人们面临的危险是变成奴隶，而在将来危险是人类可能变成机器人”。之所以“危险”，不仅在于创意阶层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与松散，而且面临着消解和“灵韵”消失的可能——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辅助，其文化内容创作易陷入对现有文化资源重复使用的循环而缺乏原创性创新，长此以往将会制约人的主体性创新。

### 遵循科技伦理实现文化守正创新

人工智能技术是一种破坏性创新，其创新速度和创新强度成为新旧文化此消彼长的关键影响因素。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在其《数字化崇拜》中强调“技术只有摆脱了神话般的偶像崇拜，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动力”。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须理性对待和积极应对，特别是关注其介入人类为创意主体的文化生产领域所

# 法律遇到 AI，如何向善而治

□ 白利寅

■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必须面对科技带来的“不确定性”挑战，如AI生成作品的版权归属问题，自动驾驶致人损害的责任赔偿问题，人脸识别技术的隐私泄露问题等，亟待法律的重新思考

成具有多个角色、包含特定运动的复杂场景。

自主创作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核心特征，同时也是法律所聚焦的关键，即如何认定这类自主创作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否定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非知识产权主体，但其创作成果是否具有知识产权客体地位要看人工智能智力贡献程度。肯定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的观点则承认超级人工智能的著作权主体地位。国内 AI 生成图片相关领域著作权第一案判决认为 AI 生成图片的本质是“人利用工具进行创作，即整个创作过程中进行智力投入的是人，而非人工智能模型”，故作为工具的人工智能不具有独立法律人格，其作品是人的作品。但该案并没有解决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知识产权争议与治理乱象。当通用人工智能被推广时，其学习性、自主性、交互性进一步加强，而被动工具性减弱，人机关系不再是主体与工具，而是合作关系，甚至是通用人工智能占主导地位，此时生成作品可能会完全不需要人的个性表达和智力贡献，如何判断创造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是未来法律设计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与主要应用于虚拟场景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相比，自动驾驶、智能家居等人工智能技术以现实场景应用为主，紧紧贴合生活，使人在物理世界深度体验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但与之伴随的则是相关技术风险和法律风险的直接性和具体化。以自动驾驶为例，由于系统故障、信号干扰、网络攻击和人为错误等原因导致无人驾驶车辆失去控制，会造成车辆、人员伤亡等灾难性后果，涉及产品责任、侵权责任，交通事故肇事责任、交通违法行为责任等多种责任，相关责任由自动驾驶设计者、生产者、销售者还是实际驾驶人承担成为理论与实践争议的问题。目前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法规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划分并未区分

传统汽车与自动驾驶汽车，而未来技术必然向完全自动化驾驶发展，届时已具备完全自动化驾驶能力且不需要驾驶人参与驾驶的汽车造成交通事故，需要更为明确的法律规范调整。2022年8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施行，这是国内首个智能网联汽车管理地方性法规，也是首部关于智能网联汽车管理的法规，代表着自动驾驶汽车逐步进入有法可依时代。

基于大数据收集与广泛模型训练的人工智能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生活便利，降低了生活成本，改变了生活习惯，如移动支付、门禁人脸识别、网约车等；另一方面有“投其所好”的本领，根据网络检索记录、购物记录、短视频观看记录甚至日常聊天对话，通过算法分析向人们推送符合“口味”的内容。故人们的偏好习惯、个人信息，甚至健康信息、财务状况等隐私信息都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数据收集和模型训练的素材，在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容易引发数据泄露，侵犯隐私、网络诈骗、传播虚假信息等违法犯罪风险。当下人们的生活对网络技术高度依赖，网络供应商、互联网平台往往处于垄断地位，拥有信息技术优势，加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不当利用增加了识别真伪、保护信息的难度，故个人维权成本不断提升。据报道，以声音合成、AI换脸、转发微信语音、AI程序筛选受害人等方式实施的AI诈骗成功率接近100%。防不胜防的人工智能欺诈陷阱成为执法打击重点，如何精准识别、有效预防和全面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行为需要立法、执法和司法的系统配合和创新完善。

### 选择与应对

与瞬息万变的技术发展和丰富多彩的社

会生活相比，法律是滞后和保守的，它仅能就既往经验和当前现实做出符合公共利益和满足社会预期的一般性规定，对所有社会主体行为提供指引和设置红线。法律的权威也来自其一以贯之的价值内核与稳定性品质。在面对人工智能科技等新生事物的时候，法律往往保持冷静克制的心态静观其变，因为立法关乎整个国家当下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对人工智能等新生事物的态度，一旦出台法律就要向社会公众提供明确的行为选择与稳定预期，朝令夕改或缺乏可操作性均会影响法律权威并造成社会混乱，故对人工智能技术立法要在充分调研、听取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各类价值衡量和多方利益表达，做出必要性、可行性、合法性与合理性分析，最终作出理性的谨慎选择。

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规范，维护社会秩序是法律的重要目标，但激发社会活力、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改革动力亦是法律的题中之义。法律的滞后与保守具有相对性，并非代表对社会现实无动于衷。法律的权威包含对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故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谨慎选择是理性态度，积极应对则是发展方向，即法律一方面要提供助推科技进步的制度条件，扫清体制机制障碍，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良性制度环境中成长发展；另一方面必须以完善立法为基础，以严格执法为核心，以公正司法为保障，有效解决因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产生的问题。这就要求法律以及法治建设自身要根据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不断更新理念、完善内容和调整方式，以新的面貌拥抱新的未来。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多名人大代表呼吁制定人工智能法，对人工智能法律问题作出全面规定。而在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其中“人工智能法草案”列入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项目，这也是该法连续第二年被列入其中。发展与安全并重，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加强依法治理，或许这就是法律遇到人工智能时所要作的最好选择。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新論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修齐治平，兴亡有贵的家国情怀，便是其中元素之一。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和精髓要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

家国情怀最初是一种由内而外，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己一家一国”这一由内而外的推演是家国情怀最初的表现。《礼记·大学》强调：“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也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是一体同构的，有“天子诸侯曰国，大夫曰家”的说法。西汉的司马迁说：“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到了东汉，经学家马融说：“夫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也就是说，个人的忠诚，起于自身，表现在家庭之中，而完成于献身国家的事业中。这些思想凝聚而成的由内而外、家国同构的秩序，成为家国情怀最初也是最深沉的积淀。

在士大夫阶层的传承下，家国情怀演变为国家统一和中华文明的认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传播，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家国情怀逐渐成为一种保家卫国、政治统一和文明认同的表达。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张为的“向北望星提剑立，一生长为国家忧”，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些诗句中饱含着尽忠为国、以身许国的传统爱国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背后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强烈认同，是家国情怀的传承丰富。

在近代，家国情怀发展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内在动力。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以家国情怀为基础的爱国主义，转化为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捍卫中华文明的强大动力。面对近代的严重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如识界关于“黄帝子孙”“炎黄子孙”的认同，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讨论，同样充分彰显了家国情怀下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团结御侮的强大精神动力。

家国情怀拥有丰富的内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修身示范是基本要求。家国情怀对每一个人提出了内在要求。古圣先贤治理国家，必须先充克自身的内在修为，而后才能建立功业。《大学》中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了修身对于家国情怀塑造的基础作用。一个人对家国的担当和责任，首先从管理好自己开始，才能“推己及人”“修己以安百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融为一体，是中国士大夫人生理想的实现路径，揭示了家国情怀的基本要求。

家国同构是显著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同构，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与国相辅相成、休戚与共。先秦时期，家国同构是家国情怀的政治基础。周代制礼作乐，大夫的封地称为“家”，诸侯的封地称为“国”，天子居于“中国”而有“天下”。此后的历史虽然与周代的分封制不同，但是“家国天下”作为一种政治文化，逐渐演变为“家国情怀”，成为一种宏大而细腻的民族情感，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中华文化视“天下之本在国家，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主张“一家长，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这些对个体与他人、个人与民族关系的认识与理解，体现出对家庭与国家关系的基本立场与要求。

责任担当是核心内容。“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家国情怀的一个核心要求，即每一个个体应当具备责任担当意识，履行责任担当精神。责任是担当的内在本质，担当是责任的行为呈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要自觉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这是新时代对担当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责任担当始终是中华民族所提倡和追求的优秀精神品质，也是传承家国情怀的核心内涵。

以古照今，家国情怀形成了鲜明的时代价值。家国情怀的逻辑起点在于自我的修养，家风的涵养和家教的养成。个人的自我修养，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为基础。新时代提倡家国情怀，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家风家教的重要性。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将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在履行家庭义务中知晓责重山岳、公而忘私的大义，在塑造和传承新时代优良家风中筑牢责任意识 and 担当精神，在正家风、齐家教中砥砺道德追求和理想抱负，将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彰显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高度契合。中国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生动诠释了家国情怀的深刻含义。正是在修齐治平，兴亡有贵的家国情怀驱动下，中国共产党人将个人和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厚植家国情怀上起到了培根铸魂、启智润心、激扬斗争的作用。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精髓要义。修齐治平、兴亡有贵的家国情怀作为塑造中华民族突出特性的重要元素之一，凝结着中国人对家国共同体归属认同、责任使命、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价值信仰，对于认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修齐治平、兴亡有贵的家国情怀，激发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各个民族成为生死与共、荣辱与共的生命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是家国情怀的旨归之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家国情怀逐渐融入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全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家国情怀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宝库和动力源泉。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 修齐治平、兴亡有贵的家国情怀

□ 刘本森

逝去年的歌手重新亮相“演唱”最新的流行歌曲，一段有电影质感的视频只需输入文字便可由 Sora 制作生成，AI 换脸真假莫辨……已渗入生活方方面面的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模糊虚拟和现实的分野，在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增加了识别真伪的成本。在这个“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则更可能为虚”的时代，如何在充分享受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有效防范安全风险，是人类拥抱未来技术的立场与诉求，也是法律不断完善的方向与动力。

### 挑战与争议

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再到互联网文明，从弱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再到通用人工智能，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科技进步史，技术的迭代更新总是不断影响和塑造人类的基本观念、生活方式、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法律以规范个人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等为目标，一方面必然要面对科技发展的现实情况以及所形成的安全风险进行系统性规制，实现法律对科技风险的有效控制，如科技立法，打击网络诈骗的行政执法等；另一方面，法律制度和法治建设本身也需要通过科技赋能不断完善创新，实现法律对科技的有效利用，如数字政府、智慧司法等。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必须面对科技带来的“不确定性”挑战：信息检索、分析归纳以及学习能力远超人类替代的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具备了对人类的可替代性，但其是否具备独立法律主体地位则是理论和实践争论的焦点，如 AI 生成作品的版权归属问题，自动驾驶致人损害的责任赔偿问题，人脸识别技术的隐私泄露问题等，亟待法律的重新思考。

以 ChatGPT、“文心一言”、Sora、“九歌”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是强人工智能的代表，其基于复杂算法、模型和规则，从大规模数据集集中学习，以创新新的原创内容的技术特性颠覆了人类对于科技的想象：ChatGPT，“文心一言”可以根据指令写作公文、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九歌”可以根据关键词指令创作律诗、绝句、对联；Sora 可以根据用户的文本提示创建最长 60 秒的逼真视频，深度模拟真实物理世界，生